

德国在袁世凯政权确立中的作用

肖建东

(武汉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 德国出于确保其侵华利益的需要, 极力帮助袁世凯建立其对全国的反动统治, 却在人民的唾弃声中避免不了失败的历史命运。这说明: 在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 任何阻碍中国进步与发展的企图终将是徒劳的。

关键词: 德国; 袁世凯; 政权

中图分类号: D829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近代的历史, 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而开始的, 充满着许多血雨腥风的艰难历程。一句话,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与中国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 加速了中国的沉沦与贫困。其中, 德国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竭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并协助他确立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通过揭示这个典型事例, 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当前世界形势, 为维护世界和平、国家主权与尊严而不懈地斗争。

德国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后起之秀, 是争霸世界的重要成员之一。它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 希望通过培植中国的反动势力并通过他们来确保其在华的侵略权益。自八国联军侵华并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后, 清王朝已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因此, 当辛亥革命的洪流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时, 实际上也是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权益的巨大冲击。因而, 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 十分仇视革命势力, 非常希望清王朝能很快平定这次革命浪潮。德国甚至抛开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达成的所谓“中立”的幌子, 以保护租界、领事馆以及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借口, 先后将“老虎”号、“祖国”号、“水獭”号3艘炮舰及其他军舰开赴汉口江面, 公然炮击汉口革命军^[1], 并在经济上全力支持清王朝。然而, 革命洪流势不可挡。

当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时, 最有实力的袁世凯成了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扶植的对象。对德国而言, 袁世凯除了实力雄厚这个因素外, 还有他对德国亲善的感情因素。早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时, 袁世凯就显示出他对德国的崇敬, 他所特聘的教官几乎是清

一色的德国军官, 并且与德国的关系开始密切起来。通过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赞同“东西互保”, 后来又曾赞助未成功的“中美德同盟”计划, 自然给德国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 认定袁世凯是维护其在华侵略权益的最好工具。因此, 当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时, 德国把扑灭革命烈火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然而, 令德国非常着急的是, 袁世凯当时并不在任上, 清廷以他患足疾为名将他开回老家河南项城, 过着田园渔翁的生活。因此, 当美国驻华公使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的倡议发出时, 德国驻华公使立即表示全力支持^[2]。焦头烂额的清廷自然不会拒绝洋人的倡议, 于1911年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督办剿抚事宜。此谕一颁布, 德国立即欢欣鼓舞, 汉口一家德国人办的日报兴高采烈地评论说: “最重要的消息当然是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袁世凯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 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面, 我们相信, 也只有袁世凯了”^[3]。德国驻华公使则表现得更为直接, 立即专电项城(即袁世凯)致贺, 以为扑灭革命烈火已指日可待。然而, 足智多谋的袁世凯嫌权力太小, 借口“足疾”未愈而不肯“出山”。这个局面令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不安, 他们敦促清廷重用袁世凯。面临灭顶之灾的清廷在洋人的劝告下于1911年11月1日作出重大让步, 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命其即行来京, 组织完全内阁, 这意味着把清廷的实权全部交给了袁世凯。消息传来, 德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组成的北京外交使团立即到清政府外务部“道贺”, 并电促袁世凯即日进京商讨对付革命浪潮的良策。在这次活动中, 德国公使表现得最为积极, 他在致本国政府的电报中强调“袁

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1]。这是德国追求其在华侵略权益能够得到保障的重要体现。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当然可以进京去镇压革命势力了,他不会忘记洋人对他的帮助,他更要借助这种帮助去扑灭已呈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当时清廷国库空虚,镇压革命的军用经费奇缺,袁世凯立即向西方列强求援,要求包括德国在内的“四国银行团”总付币制实业借款余额以充军费。消息传出,南方革命势力纷起抗议,列强各国因担心各自的利益因此受到损害而决定暂缓提供贷款。德国政府对此十分不满,担心它(袁世凯政府)得不到钱,不能镇压革命,欧洲将首先受害。于是,德国政府单独行动,通过德商瑞记洋行慷慨地贷款资助袁世凯。同年12月1日该行再次向袁世凯贷款30万英镑,被袁世凯派往汉口镇压革命的冯国璋部还获得了汉口瑞记洋行提供的军需和运输上的便利^[4]。获得援助的袁世凯腰板硬了起来,为了追求绝对的权力,他一方面借清廷之力压南方革命势力,另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势力胁迫清廷,并很快迫使曾迫害过他的摄政王载沣退位,袁世凯从此集清廷军政大权于一身。镇压革命心切的德国此时更为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为他撑腰打气。当时的德国公使在给德国首相的报告中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他说:袁世凯已被赋予最广泛的权力,中国皇室的命运将完全取决于他,为了防止有可能出现的对德国利益不利的革命党人组织共和国的企图,列强必定有意地协助袁世凯所代表的政府中的保守分子。据此,这位德国公使建议其政府不必在乎革命党人对德国侨民的“暴动”和抵制德货运动,“无保留地立即予袁世凯以金钱协助是应该的”^[1]。德国政府当然立即采纳并付诸行动。

然而,袁世凯镇压革命的结果乃是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到1911年11月下旬,中国的大部分省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为了避免出现中国立即分裂或清朝完全覆灭的结局,德国伙同其他列强极力敦促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势力议和,以阻止革命烈火的进一步蔓延。同时,德国伙同其他列强对革命势力进行经济上的抵制,宣布中国海关盐税收入作为中国外债之担保,不准中方动用,并宣布对南北两军(实际上只对南方)都不贷款,迫使军费奇缺的南方革命势力议和。由于南方革命势力的软弱,加上德国等西方列强的阴谋和破坏,南北议和谈判终于在1911年12月18日在上海举行。谈判的焦点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对于事关中国前途的和谈,德国自然极为重视。为了使和谈朝着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发展,德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一方面,德国派遣驻沪总领事与其他列强的驻沪总领事一起列席南北和谈,以监视和谈的

进展;另一方面,德国又提醒袁世凯积极备战,以武力作为和谈的后盾。为了袁世凯的武力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德国代表柯达士(H. Cordes)提醒山东巡抚孙宝琦:不要把帝国主义的“中立”放在心上,驻山东的北洋陆军第五镇和其他清政府的军队尽可以利用德国控制的津浦铁路北段运兵南下,以便与驻扎在徐州的张勋部队一起进逼南京。这时,南北和谈波澜迭起,南方革命势力坚决要求实行民主共和。为了将革命势力压下去,以德国驻沪总领事为领袖的六国驻沪总领事公然直接出面,向和谈双方递交了一份同文照会,声称他们有义务非正式地唤起双方代表的注意,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达成足以防止目前冲突的协议。照会对南北双方似乎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迫使南方革命势力同意接受一个对北方有利的“和平”协议。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久负革命盛名的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南方革命党人一下子有了自己的领袖,革命势力进一步高涨。1912年元旦,革命的大本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具有崇高威望的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呼吁帝国主义列强承认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德国政府自然不会理睬,其他列强亦然。不仅如此,扼杀革命的秉性更加顽固。这时,河北滦州的驻军发生了一次真正的兵变,起义军虽在起义的次日向天津进发途中失败,但一时在京津地区引起极大的震动。同时,秦皇岛附近的驻军也有不稳的迹象。这给急于干涉中国政局的德国与其他列强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借口,他们借口铁路有遭受破坏的危险,立刻出动军队分头占领自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的铁路上,以稳住袁世凯的后方阵地。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平等条约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严厉镇压革命势力。1912年1月下旬,革命党人指挥山东民军攻占即墨,德国当即借口不平等条约中关于胶奥50 km内中国驻军应与德国“会商办理”的规定,胁迫民军撤退,并宣布禁止革命军通过胶州湾附近50 km之地,却暗示清军可以自由出入。清军会意,乘机突袭即墨,杀害革命党人30多名,德国的帮助由此昭然若揭。不仅如此,德国还欲继续从经济上置南方革命党人于死地而后快。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费奇缺,而各口岸海关的丰厚税款又被帝国主义列强霸占,革命党人只好向各国列强请求经济援助。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向英国请求贷款200万两白银,许诺以中国招商局船只作为60万英镑贷款的抵押。德国闻讯,立即游说英国,并联合其他列强一起向英国施加压力,宣称:“倘北京政府同意这笔借款,他们就赞成这笔贷款。”^[1]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怎么会同意呢?致使这笔借款搁浅。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毕竟能勉强维持正常运转,这

是德国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德国伙同其他列强借口他们劫夺的全部海关税不足以抵充到期的外债和赔款,向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军政府一再催索,企图使本已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势力进一步滑向崩溃的边缘,起码也可以乘机压迫南方向袁世凯妥协。

然而,革命势力不仅没有垮下去,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民主共和的声浪遍及南北,清王朝的崩溃已是大势所趋。德国不甘心自己的势力遭受挫折,仍然为挽救清王朝的倾覆而竭尽全力,其希望仍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根据本国政府的授意,公开宣称:赞同内阁总理所代表的政府和策略。德国在东亚的主要报纸《上海德文新报》继续鼓吹保留清王朝,反对民主共和。1912年1月下旬,南北和谈几乎陷于破裂境地。为了进一步增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王朝的实力,德商瑞记洋行连续两次向清政府贷款共75万英镑(合白银730多万两),其中大部分用于清政府向德奥等国购置军火^[4]。同月,德国“细勒细亚”号装运一大批军火运往华北,准备装备清军。可以说,德国不仅仅是经济援助,而且是军火支援,比原来更进一步。德国还倡议“四国银行团”将一笔约8亿马克的贷款提供给袁世凯的清政府,但因其他列强对革命势力的惧怕和内部勾心斗角而搁浅,德皇威廉二世因此恼怒地抱怨英国人:这是不顾道义地抛开清室的好听的借口。面对浩浩荡荡的革命浪潮,德国只能是徒唤奈何。不仅如此,连德国和其他列强共同扶植的袁世凯出于自己的目的也公开抛弃了清王朝。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了。

德国之所以要竭力扶助清王朝,无非是借助清王朝这个听话的工具以维护其在华既得的侵华权益,并借助它维持各国在华侵略权益的现状,以便德国把争霸的重点放在欧洲。既然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崩溃了,希望也就如肥皂泡般破灭。值得德国庆幸的是,它一直支持的袁世凯仍然是一张王牌,他可以取代清王朝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奴役的工具,其他列强也有如此共识。因此,清王朝垮台后,德国伙同其他列强,决定继续支持袁世凯,希望他收拾南方革命势力,给列强的在华侵略权益提供最大的保障。早在1912年1月中旬,当袁世凯要求由清廷“授权”组织临时政府时,德国就预感到:在袁世凯领导下,一个假的共和国政府将出现,它能以高压手段在表面维护政党政治方式下维持治安。应该说,德国的预感是相当准确的,因而也就更加坚定了它支持袁世凯的信心。在德国与其他列强的

大力支持下,南方革命势力妥协了,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贯敌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德国与其他列强立即改变原来的立场,纷纷向袁世凯这位新任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道贺,并且着手向袁世凯政府提供财政经费。出于遣散革命势力的需要,袁世凯向西方列强提出了“善后大借款”的要求。德、英、法、美“四国银行团”立即决定贷款700万两白银,并于2月28日提交了首批200万两贷款,以应袁世凯的急需和遣散革命军队。德国害怕袁世凯经费仍很紧张,以德商瑞记洋行的名义另外贷款45万英镑,以应袁世凯的不时之需。

然而,革命党人中有很多不甘心妥协的人,这时的孙中山也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孙中山在辞职前让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用法律来约束袁世凯。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正式辞职的3个条件:一、定都南京;二、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其核心是将袁世凯置于革命党人的掌握之中,避免革命中途夭折。为此,孙中山派遣以蔡元培为团长的迎袁专使团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袁世凯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他表面上全部答应孙中山的要求,而在暗地里却要着阴谋。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兵变先后在北京、天津、保定之间蔓延开来,然后,袁世凯以北方不稳为借口拒绝南下,并请帝国主义列强设法维护北京的秩序。以全力支持袁世凯为己任的北京外交团立即召开会议,德国和其他列强一致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军队在通衢大道上担任巡逻,同时增派军队,加强北京使馆区的护卫,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德国自然表现得最为积极。3月3日,德国从天津调兵200人开往北京,与其他列强一起组成3000人的部队在北京街头巡逻示威。3月5日,德国从青岛出动军队100人与日、俄军约2000人一起开赴天津。就这样,德国和其他列强就此机会制造紧张气氛,造成瓜分中国的阴影,向革命势力施加压力。德国和其他列强的报刊也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出发,连续发“专电”称:各国公使均以帮助袁世凯为平乱的唯一妙法,深望南京政府许袁世凯在北京履任,若不立即组织共和政府,各国便将干涉。为了稳住阵脚和增强实力,袁世凯紧急向“四国银行团”求援。德国驻华公使闻讯立即行动起来,主张:“迅速给袁世凯款项,俾他发放兵饷以防再有兵变及扰动事项是迫切的。”^[1]德国公使的倡议立即获得其他列强的支持,“四国银行团”遂于3月9日向袁世凯贷款110万两白银,从而满足了袁世凯的急需,稳住了他的阵脚。而对于南方革命

势力,德国与其他列强一起,百般扼制,只希望袁世凯能借助他们的援助将南方革命势力扫个一干二净。当时孙中山也认识到北方兵变是个骗局,曾准备从汉口、浦口、烟台调兵北上,却遭到袁世凯的断然拒绝。德国和其他列强组成的北京外交团密切配合袁世凯的行动,害怕南方军队真的从烟台开赴天津,便一致照会袁世凯:将1911年暂允中国军队进驻天津周围10 km的变通办法作废,不允许任何类型的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的禁区。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压力下,南方革命势力在内外交困中屈服了。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随之迁至北京。在德国及其他列强的全力支持与帮助下,袁世凯终于摘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实现了他在全国的反动统治。袁世凯当然不会忘记报答,上任伊始就再三强调:对于列邦,尤须讲信修睦,通令各地讲究约章,切实遵守,勿得稍有违犯,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只有这样,乃可巩固邦基,安危存亡,胥视乎此。这就意味着,袁世凯继清王朝之后成为德国及其他列强维护其在华侵略权益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也意味着实现了德国及其他列强所预期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就此销声匿迹,刚好相反,中国革命仍在继续向前发展,袁世凯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而更大的革命风暴还在后头,只不过袁世凯反动

政权的建立加剧了革命的艰巨性而已。

纵观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并在全中国确立其反动政权的全过程,德国及其他列强的竭力扶助是相当显著的,而袁世凯对它们的报答也是明白无误的:竭力维护德国及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各种侵略权益。中外反革命势力就是如此相互勾结,不断镇压蓬勃发展的中国革命势力,不断阻碍中国的进步与繁荣,从而使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就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列强是不允许中国独立与富强的,而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则是它们的走狗与工具。不管他们如何阻挠,中国革命的历史车轮是阻挡不住的。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终于迎来了民族的解放并不断走向繁荣。

参考文献:

- [1] 孙瑞芹.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2] LEVI W. Modern China's Foreign Policy[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3.
- [3] 中国史学会. 辛亥革命资料(八)[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4] 徐义生.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 于华东)

Germany's Effects on establishment of Yuan Shi-kai's political power

XIAO Jian-dong

(Humanities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3, China)

Abstract: Germany tried to help Yuan Shi-kai to establish his reactionary political power in whole China for German aggression interests in China, but it didn't avoid its historical fate of failure in the spurning sound of people. It shows that the any attempt obstructing Chinese advance and development will always is futile effort in the face of the awakening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Germany; Yuan Shi-kai; political powers